

王云五汉语语文辞书编纂概况

刘善涛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王云五主编的《王云五大辞典》《王云五小辞典》《王云五小字汇》《王云五综合词典》《王云五新词典》《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为知识的普及提供了一系列的查阅工具,也为汉语语文辞书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文章对王云五汉语语文辞书编纂的概况进行介绍。

关键词:王云五;汉语语文辞书;编纂概况

中图分类号:H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5)01-0066-03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5.01.016

The Compilation of Wang Yunwu Chinese Dictionaries

LIU Shan-t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Wang Yunwu compiled various types of dictionaries such as *Wang Yunwu Great Dictionary*, *Wang Yunwu Concise Dictionary*, *Wang Yunwu Concise Lexicon*, *Wang Yunwu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Wang Yunwu New Dictionary*, *Zhongshan Great Dictionary*, all of which are useful tools for popularizing knowledge and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dictionarie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compilation of Wang Yunwu Chinese Dictionaries.

Key Words: Wang Yunwu; Chinese dictionaries; compilation

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始终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大出版社”,与英国的牛津、美国的郎曼辞书出版公司平起平坐^[1]。王云五自1921年9月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持编译工作,1930年1月担任总经理全面主持商务,到1946年5月辞职从政,在整个民国期间为商务印书馆辛勤工作了25年。在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的混乱时期,王云五能够为商务印书馆,甚至中国近代文化力挽狂澜,坚韧地推动着中国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显示出深厚的学术涵养、强大的人格魅力和坚定的民族气节。但是由于王云五本人的政治倾向问题,一直很少被大陆学者提及。直到近年来伴随着学术界晚清民国热的兴起,王云五才引起了某些学者的关注,但大多集中在出版学、管理学、目录学等方面。在辞书研究中,学者们对四角号码检字法大都比较熟悉,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对王云五本人的辞书编纂情况却不甚关注,缺少研究。

一、王云五系列语文辞书的编纂背景

辞书的编译和出版向来是商务印书馆的重要工作内容,早在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之时就成立了编译所,负责编

译教科书和工具书。1906年,《新字典》和《辞源》编纂之初又设立了专门的辞典部,之后又细分为国文字典委员会、英汉实用词典委员会、外国人名大辞典委员会和哲学大辞典委员会。王云五进入商务之前既已通过中外工具书潜心自学,进入商务之后审核校对、参与编写的辞书不可计数,对中外辞书的优劣有了一定的了解。有感于汉语词典检字的困难,在1924到1928年间便展开了对四角号码检字法的研究,并一举成名,至今仍被使用。

王云五是一位敢想、敢做、敢于“已所欲则施诸人”^{[2]60}的行动家。四角号码检字法毕竟只是一种检字方法,要想被更多的人接受必须通过辞书的出版和使用。因此在该检字法发明完成后,王云五便立即将之前按部首检字法排列的《学生字典》^[3]和《国音学生字汇》^[4]按照四角号码重新排版印刷。结果由于这两本词典“沿用多时”,“世人狃于习惯”不愿采用新法^[5]。再加之,这两本词典“所载均以单字为限,于读者阅报时遇着不明白的词语便无从索解”(《大辞典》序)。于是,“笔者遂转念,别编一种工具书,体例与向有者不同,即按四角号码顺序,以新法排列新稿,籍瞻其效用……自时厥后,笔者于编纂辞书之兴趣,日益浓厚,与其对检字法之研究无异”^[5]。

收稿日期:2014-11-15

作者简介:刘善涛(1985—),男,山东滕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词汇学与词典学研究。

二、王云五系列语文辞书的编纂情况

纵观王云五的一生,他所主持编纂的汉语语文词典共有6本,涵盖了字典和词典,普通语文词典和新词语词典,小型、中型、大型甚至巨型辞书的不同类别。

《王云五大辞典》(简称《大辞典》)民国十九年(1930年)七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九月再版。二十一年(1932年)七月国难后第一版;二十一年(1932年)八月国难后第二版;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国难后第三版;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国难后第五版;二十四年(1935年)五月国难后第六版;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国难后第八版;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国难后第九版;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国难后第十版;二十九年(1940年)五月国难后第十四版;二十九年(1940年)十一月国难后第十五版^①。

《大辞典》是王云五主编的第一本语文辞书,其直接动因虽在推广和检验四角号码检字法,但也是为了改进原有词典的诸多弊端。王云五在序中说“我国字典词典向来有最大权威的,当推康熙字典和辞源两种”,前者“握着字典界的牛耳”,后者是“词典界的鼻祖”。但是前者只收单字,且释义“不合现代的需要”,词典检索也极为不便;后者检查方法仍袭前者,且需补录新词,以便查检。因此,该词典本着“检查便捷”“取材充分适宜”和“解释明白切当”(《大辞典》序)的三大原则,从“高中以下各科课本和四百余种补充读物”中统计分析各类词语的出现频率作为词典的选词依据,按照第二次改订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依次排列,用“语体文”(即“白话”一笔者注)释义,并区分单字的不同词性和词语的不同义项,“以与人正确观念”。该词典的编纂宗旨在“以极便利极经济方法将万有的知识贡献于一般人”(《大辞典》序),因此词典最后还附入了30种参考表,“任何科学,任何知识,均括入其中,对于学生修学,教师教学,和一般人参考都有极大效用”(《大辞典》序)。在结构安排上,《大辞典》包括四角号码歌、目录、本书排列法说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序、编辑凡例、正文、附录、笔画索引、版权页等内容,增订本还有“增订版序”。

《王云五小辞典》(简称《小辞典》)民国二十年(1931年)七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二十一年(1932年)五月国难后第一版;二十三年(1934年)五月国难后第二十二版;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出版第一次增订本,为国难后第三十六版;二十五年(1936年)国难后第五十五版;二十九年(1940年)十一月国难后增订第九十五版;三十四年(1945年)三月第二次增订本重庆第一版;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第二次增订本上海第一版;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第二次增订本上海第四版;三十五年(1946年)十二月第二次增订本第十二版;三十六年(1947年)九月第二次增订本第二十一版;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第二次增订本第二十九版;三十七年

(1948年)六月第二次增订本第三十一版;三十八年(1949年)三月第二次增订本上海四十四版;三十八年(1949年)四月第二次增订本上海第四十六版。1945年香港华侨辞典出版社也出版了该辞典的第二次增订本,1990年还推出了新版。

《王云五小字汇》(简称《小字汇》)分为普通本和硬纸面本两种。前者二十四年(1935年)八月初版,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五十九版,二十六年八月增订第一版,三十五年(1946年)十二月增订第五十二版,三十六年(1947年)八月增订第五十六版,三十八年(1949年)五月增订第七十八版;后者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第一版,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硬纸面本第五版,三十年(1941年)八月硬纸面本第七版。1950年台北华国出版社重新印刷发行了第二次增订本,1954年再版,1961年第四版,1965年第十一版。2004年5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再一次重新发行了《小字汇》。

王云五曾自己评价其一生的特点为“擅长计算”,“无论做任何事,须要计算其利害得失,究竟利与害孰多,借为判断的标准”^{[2]15},《小辞典》和《小字汇》的出版恰能体现出这一点。《小辞典》分为初版、第一次增订版、第二次增订版三个不同的版本,后两次增订只是在初版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词目,扩大了该书的读者范围,也为以后出版《综合词典》打下了基础。初版《小辞典》是“为着供应小学生的需要,以该书(即《大辞典》一笔者注)为蓝本,删节改编”(《综合词典》自序)而成,全书分量仅及《大辞典》“五分之一”,读者对象为小学生。因此取材“全照拙著大辞典的编辑原则”,单字“仅减去少数”,词语较《大辞典》“删减十之五六”,保留“八千余条”。除了具备《大辞典》编纂的所有特点外,《小辞典》为了避免与前者过于重复,增设了两处特点:一是“在结尾的词语之下,有入同字的接头语”,即在单字下专门列出以该字结尾的逆序词;二是“在单字之外,兼列其同训异义字”,即在单字下专门列出单字的近义字。如“议”字条目下列出“接头语:建议、密议、参议、抗议、会议、和议、拟议、众议、协议;同训异义字:计、谋、图、商”。

《字汇》原是明人梅膺祚编的一本大型字典,因其体例新颖,对《正字通》《康熙字典》等后世字书的编纂产生了较大影响,所以被人们熟知,民国年间即有不少字典以此命名,如《京音字汇》(1913年)、《学生字汇》(1928年)、《标准字汇》(1936)、《国音常用字汇》(1949年)等。《小字汇》初版实为“王云五小辞典的简编,换句话说,就是采取那本书全部的单字,而删去其中的词语”(《小字汇》序),按四角号码顺序依次排列,标注词性,并将《小辞典》中提到的创新点,即字头的“同训异义字”列在释义内容之下。初版所收单字七千余条,实际也是《小辞典》的收字数。增订本的收字数量“增至九千

① 由于资料搜集的限制,我们将经眼所见、确实无误的王氏辞书版本详列文中,其他版本待以后继续补充。另几种辞书版本列举同此。

六百余条,表面上计增二千余字,但同字之读音不同而意义互异者,检查便利起见,作为新字排列;因此一项增出之字不下五百,故实际增加之字为千六百有奇”(《小字汇》增订本序)。增订本实际上将同音字单独列为条目,体现出字典编纂的创新和辞书编纂的现代性。

1949年2月,王云五迁居香港,四月得蒋介石资助创办了华国出版社。该公司“在台湾登记,在香港印制,分别在台港两地发行”^[1]。公司“以工具书为维持营业之基础,教科书副之”^[1],《王云五综合词典》的出版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

《王云五综合词典》(以下简称《综合词典》)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一月香港华国出版社初版,四十八年(1959年)增订本三版,五十七年(1968年)增订本十版。三十九年(1950年)台湾华国出版社再版,四十三年(1954年)增订本三版,五十九年(1970年)八月第四次增订本十版,七十五年(1986年)第五次增订九版。2004年5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初版,2007年12月王学哲增订初版。

《大辞典》出版以后一直未作修订,而《小辞典》虽是前者的删节本,但出版后“迭经增订,凡原编大辞典未收入的新资料,先后加入者甚多,其性质已不再是大辞典的节本,其用途也超过了小学生的范围”(《综合词典》自序)。再加之当时的台湾和香港缺少词典,两本词典也有修订翻新的必要,因此华国出版社出于自身发展考虑将它们“合并统编,按目前之需要与最新之资料重新编著”(《综合词典》自序),“删去不甚需要或失时效者,并尽量增入最新十年来的各种新资料”(《综合词典》编辑凡例)。该词典除保留了以前两本词典的特色外,在“各单字类语对话(即近义词反义词一笔者注)之下,辟词藻一栏,就该单字为首之简明词语,检取同一意义之典雅词语或其他成语,以助作文炼句”(《综合词典》编辑凡例)。如“真”字下列出“类语:信、诚、固、允、良、洵;对话:假、伪;词藻:真伪不分=玉石混淆、真才=真金不镀、真相难见=庐山面目、真相显露=水落石出”。

《王云五新词典》(简称《新词典》)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重庆初版,三十三年(1944年)八月重庆再版,三十四年(1945年)十二月上海初版,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上海再版,三十六年(1947年)七月上海三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出版台一版,1977年台二版。

我国语文辞书的现代化固然出于多方面的因素,但社会的巨变,新词的增加,原有辞书已不合时代需要等则直接推动了新型辞书的编纂,已出版的新型辞书,如《新字典》《中华大字典》《辞源》等都比较重视修订和增补新词新语,然而在《新词典》出版之前还没有专门收录和整理新词语的辞书。王云五有感于当时流行的许多新名词,国人或以为“传自日本”或认为“初期传教士与译书者所创用”或视若“著作家或政治家之杜撰”,其实“追溯来源,见于古籍者不在少数”,只是所谓新词的意义“有与古籍相若者,有因转变而大相悬殊

者;且古今应用不同,名同而实异者亦比比皆是”(《新词典》自序)。有感于国人对新词来源和意义分辨不清,王云五“就所藏佩文韵府摘取看似新名词之词语,述其来源,并附以今古不尽同之释义,计得三千七百余条,汇列一册”(《新词典》自序)编纂成书。该书目的在“追溯新名词之来源,各举其所见之古籍篇名与辞句,并作简单释义,其有数义者分别列举之。至现今流行之意义与古义不同者,于各该条下附述今义,而以[今]字冠之”(《新词典》自序)。如:

[主教]主管教化。(《周礼·设官分职疏》)天官主治,地官主教。

[今]天主教中主持传教之一种教职,位于神父之上。

[便衣]寻常的衣服。(《汉书·李陵传》)陵便衣独步出营。

[今](1)同上。(2)非军装的(例)便衣队。

《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简称《“一”字长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二月香港商务初版,二十八年(1939年)四月上海商务再版,二十八年(1939年)五月第三版。196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台一版。

中国的辞书编纂向来有求大的传统,古代的《玉篇》《类篇》《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近代的《新字典》《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等,但是这些辞书的释义原则不够明确,义项排列也较为凌乱。起源于18和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到欧洲的语言研究和词典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批“按史则”编纂的大型辞书不断问世。如德国的《德语词典》(1852—1960),法国的《利特雷词典》(1863—1873),英国的《牛津英语大词典》(1884—1928)等。这些辞书被一些留学归国的学者介绍到国内,特别是《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引进使学者们也逐渐勾勒出中国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框架。1918年黎锦熙在国语统一筹备会刚成立时就提出要“按史则”编纂汉语辞书的计划,1927年刘复起草了《编纂〈中国大字典〉计划概要》,1928年黎锦熙、钱玄同、吴稚晖等组织成立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29年黎锦熙在《国语旬刊》的《发刊辞》里明确提出“编纂大规模的辞典——结算四千年来的国语(文字和语言及其所包的一切新旧学术文化等)底总账”^[6]。奈何时局动荡,这一编纂计划未得到全面实施,但其影响是不可磨灭的,直到1945年王力还认为这才是“理想的字典”的编纂方法^[7]。

王云五自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以来编印了各种类型的丛书,如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农工商师范算学医学体育各科小丛书、中学生文库、小学生文库、幼童文库等,以及最富盛名的万有文库,以期为社会、各种人群提供全面的文化食粮。《“一”字长编》的编纂则是王氏以辞书的形式为社会提供可资参考的综合性大型工具书的一种体现,也是王氏眼中的“创造性出版物”^[8]之一。

用王云五自己的话说“中山大辞典之编纂,实肇端于(其本人的一笔者注)不自满与不自量”^[5]。《王云五大辞典》出版以后,王氏并没有满于现状,一直在搜罗资(下转第108页)

否进入到该领域工作,同时也可以影响到已经就业的学生的职业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不仅仅是纯粹的语言训练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更重要的是能力的培养。所以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要强化学生中日两种文化的理解能力,利用一切机会向学生渗透日本文化知识,并引导学生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比,让学生逐渐地认识日本、了解日本和理解日本,用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去学习日语,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6]。

参考文献:

- [1] 郭宁. 应用型日语人才的培养[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8(8): 59-60.

- [2] 王连娣. 应用型日语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构建[J]. 中国西部科技, 2013(2): 112-114.
[3] 陈钟善. 日语教学中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体系[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3(1): 184-185.
[4] 陈要勤. 珠三角日语人才市场需求调研与专业人才培养策略[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1(9): 104-107.
[5] 汪洋. 日企人才需求与应用型本科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J]. 职业时空, 2012(9): 52-54.
[6] 刘双喜. 河北省高校日语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调查及专业人才培养对策研究[J]. 教学研究, 2013(2): 29-31.

(责任编辑:李高峰)

(上接第 68 页)料,以“备增订王云五大辞典之需”,“计自民国十七年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以前,九年之间,无日不从事于此”^[5]。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春,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相关人员“就彼时已搜集之资料卡片六百余万纸,详加检视”,然后提议利用此项资料,资助王氏编纂一部与“英语牛津大字典大致相同”的大辞典^[5],原定为“四十巨册,合五千万言,并由该馆与商务印书馆订约,稿成由商务印书馆陆续付印”。王氏随后起草了该辞典的编纂计划,就辞典的体例与内容、编纂与印刷、经营、编纂处的组织、补充资料、编纂原则、单字编纂、辞语编纂、条文排列等各项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奈何“夫以如是庞大之工作,成于如是忙乱之时期,误漏冗滥,岂能幸免”,再加之“八一三”沪战突发,纸版铅字尽毁,中山教育馆也暂停资助,王氏不忍多年的辛苦工作就此湮没世间,所以力排万难,在香港出版了《“一”字长编》。

三、结语

王云五在自传中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人生斯世,好像一次的壮游”。王云五一生的辞书编纂也是绚丽壮观的,除上述 6 本汉语语文词典外,王云五还参与了英语类辞书的编纂,曾主编了《(英汉对照)百科名汇》(商务印书馆 1931 年),校对了《现代汉英辞典》(王学哲主编,商务印书馆 1946 年),同时还曾计划编辑过《中国百科全书》和《古体大字典》,前者将近完成一半,后者也已陆续“发交制版”,但都分别被“一·二八”和“八·一三”的战火无情焚毁。赴台后,除编纂了前述《王云五综合词典》外,还编写了《中国史地词典》(华国出版社 1968 年)、《英汉双解英文成语新词典》(华国出版社 1982 年),在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时,还编辑出版 12 册的《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1970—1971 年)、10 册的《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1972—1975 年)、10 册的《中正科技大辞典》(1978—1979 年)三部大型百科辞书,既完成了其本人编纂大型汉语工具书

的夙愿,也为我国的辞书编纂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云五汉语语文辞书的编纂集中处于《新方言》(章炳麟 1907 年)、《新字典》(陆尔奎 1912 年)、《中华大字典》(徐元诰等 1915 年)、《辞源》(陆尔奎 1915 年)之后,《国语辞典》(黎锦熙 1937 年—1945 年)、《中国大辞典》(未完成)、《理想的字典》(未完成)、《新华字典》(1953 年)、《现代汉语词典》(1973 年)等词典编纂之前,处于中国语文辞书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关键环节。因此,对王云五汉语语文辞书的研究能够加深对王氏本人辞书学思想的认识,对中国语文辞书现代化发轫时期时代状况和学术状况的分析,对于全面认识中国语文辞书的发展面貌亦有很大帮助。

参考文献:

- [1] 吴永贵. 商务印书馆对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J]. 出版发行研究, 2001(9): 73-76.
[2] 王云五. 岫庐八十自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3] 陆尔奎, 方毅. 学生字典[K].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5.
[4] 方毅, 马瀛. 国音学生字汇[K].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9.
[5] 王云五. 编纂中山大辞典之经过[J]. 东方杂志, 1939, 36(1): 5-15.
[6] 黎锦熙. 国语运动史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200-230.
[7] 王力. 理想的字典[J]. 国文月刊, 1945(33).
[8] 王云五. 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 下[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8: 1168-1201.

(责任编辑:白丽娟)